

江西通史 4

钟起煌 主编

隋唐五代卷

陈金凤◎著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隋唐

五代

主编 钟起煌
顾问 周銮书
副主编 邵 鸿

彭适凡(常务)

方志远

江西通史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通史·隋唐五代卷/陈金凤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12

(江西通史/钟起煌主编)

ISBN 978-7-210-03930-3

I. 江... II. 陈... III. 江西省—地方史—隋唐时代
②江西省—地方史—五代十国时期 IV. K2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3119 号

江西通史·隋唐五代卷

陈金凤著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8 插页:4

字数:460 千 印数:1-3200 册

ISBN 978-7-210-03930-3 定价:60.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江西通史》编辑委员会

主任 钟起煌
副主任 钟健华 傅伯言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志远 孙家骅 邵 鸿 林学勤 彭适凡

编委会办公室

主任 孙家骅
副主任 游道勤

工作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琴红 王紫林 曾 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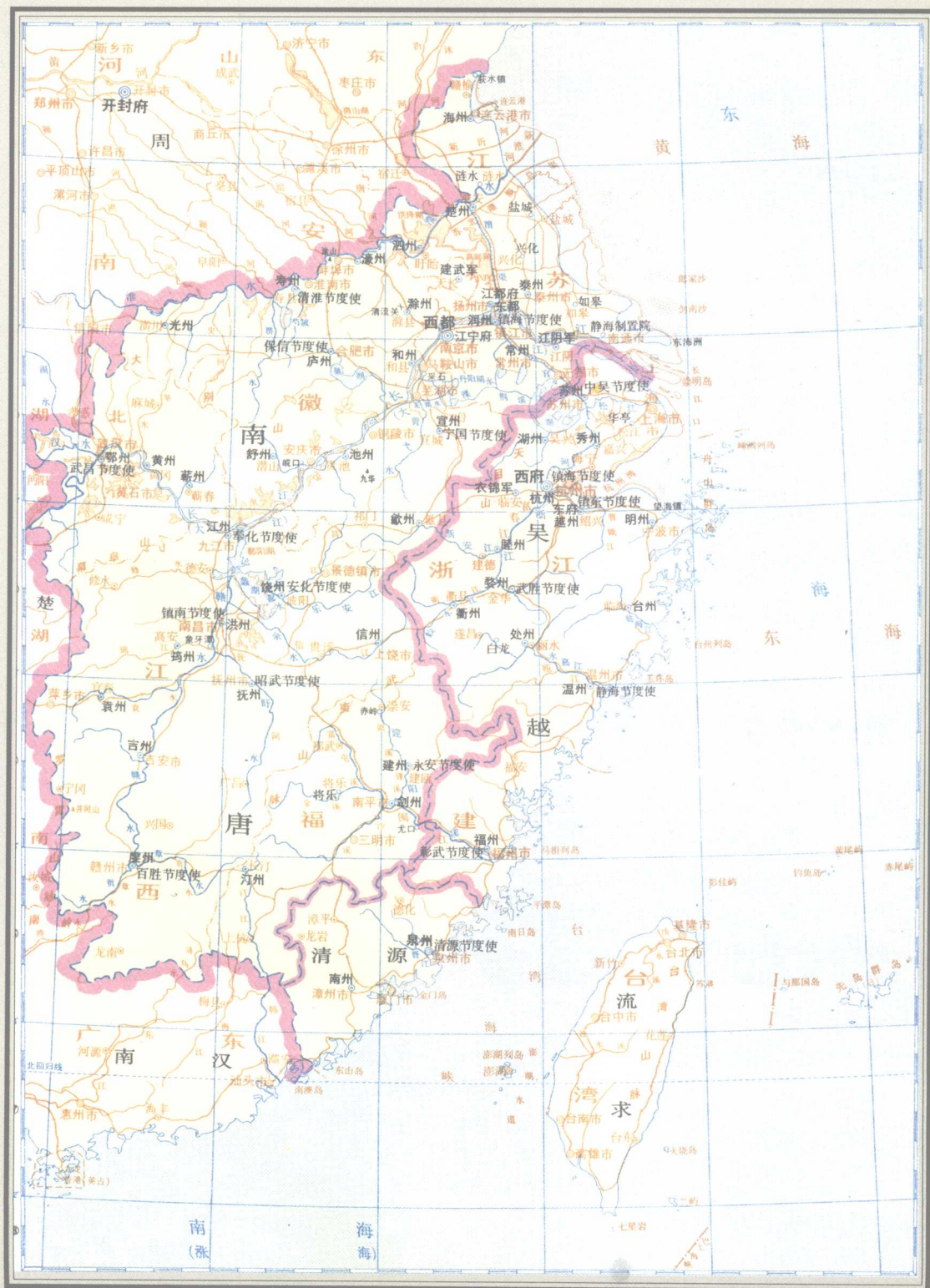
常务编辑

林学勤 徐建国 游道勤

江西通史

隋唐五代卷

陈金凤
著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吴越地图

①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江南西道图（唐）

② 祖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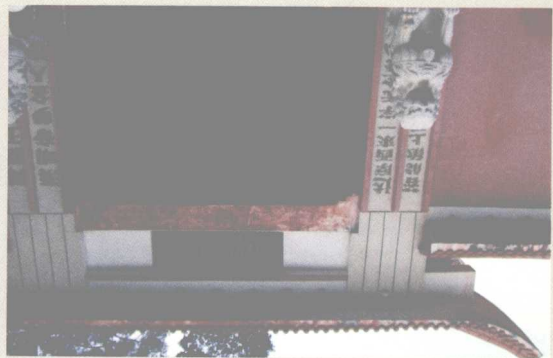
③ 青原山净居寺

④ 青瓷象首净瓶（隋）

⑤ 白釉褐彩元宝形枕（五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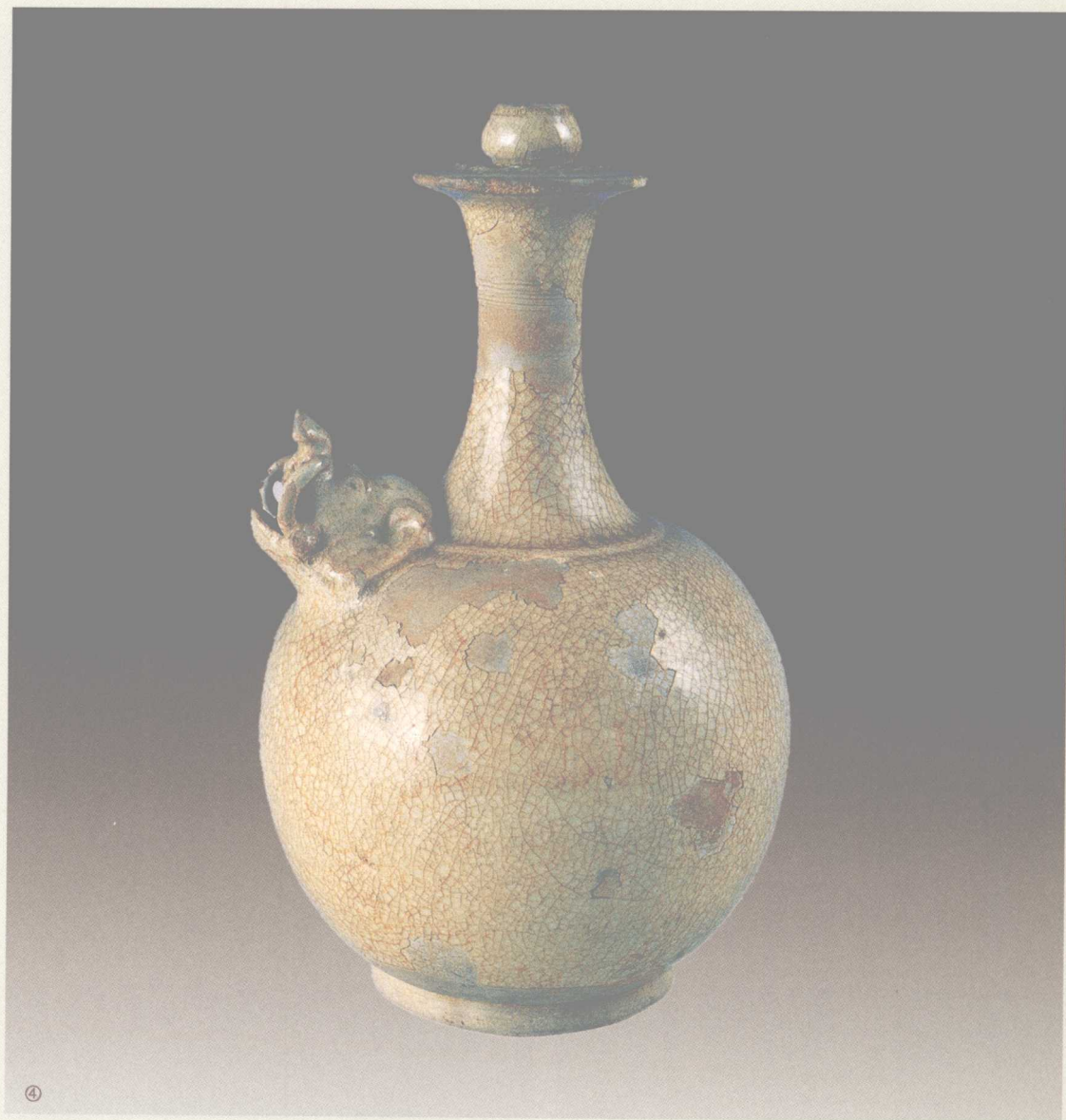
⑥ 炼形神治瑞兽纹铜镜（唐）

⑦ 褐釉扑满（五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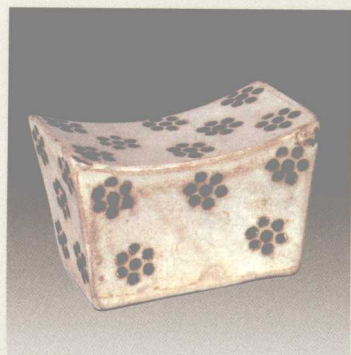


③





④



⑤



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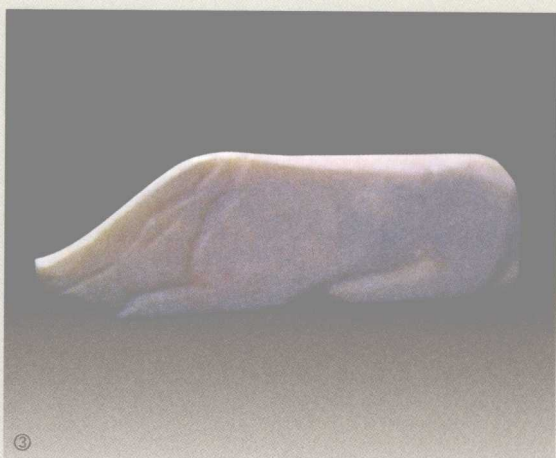
⑦



①



②



③

①青铜钟（唐）

②青瓷多足辟雍碗（唐）

③滑石猪（唐）

总序

钟起煌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由机缘而起因执著而成,包括我们这部《江西通史》。

说由机缘而起,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几乎纯属偶然。2002年夏天,我和彭适凡、孙家骅同志谈到江西悠久的历史、谈到江西辉煌的文化,因而产生了组织专家编撰《江西通史》的设想,彭、孙二位当即认为此举当行而且可行。

说因执著而成,是因为一旦有这个想法,而且认为这是一件研究江西历史、弘扬江西文化的重要工程,就决心去做。为此,我征询了周銮书同志的意见,并邀请邵鸿和方志远同志共商此事,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2002年10月18日,在江西省文物局和江西师大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共同举办的全省文博教育成果展示与经验交流会上,我向大会通报了编撰《江西通史》的意见,引起全体代表的热烈反响,大家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示支持,认为这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挖掘和整理江西传统文化、推进江西经济文化建设的一大盛事。有了这个共识,12月13日,准备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在我的主持下,召开了有关专家和编辑人员的联席会议,对编撰《江西通史》的指导思想、作者人选、工作日程、成果形式等具体问题展开了比较细致的讨论。2003年2月15日,召开了第一次编撰工作会,《江西通史》的编撰工作就此正式启动。

虽然说是机缘和偶然,但新的《江西通史》的编撰,实已具备诸多因素和条件。

一、江西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在江西这块土地上,人类的活动至少已有20万年历史,它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和古代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遂为

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其物产之富、人才之众,举世瞩目;进入20世纪,江西又因为中央苏区的建立而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很难想象,在十分漫长的时段里,没有江西的中国历史将会是什么样子。

二、文献与实物资料丰富。江西既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唐王勃语),又素称“文章节义”之邦(宋司马光语)和“人文之薮”(清乾隆帝语),存世官修私撰文献极为丰富。近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既可弥补文字记载之不足,更可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为编撰《江西通史》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证材料和科学依据。

三、前期成果丰硕、学术队伍整齐。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仍然健在,他们不但学术积累深厚,而且对研究江西历史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中青年学者正趋成熟,他们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又吸收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思维敏捷,勇于创新。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年来已有大批高质量的有关江西历史的学术成果问世,这些成果涉及江西历史的方方面面,为编撰《江西通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四、政治环境宽松、经济形势发展。盛世修志是中国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江西经济和全国一样,有较快速度的发展。这为编撰《江西通史》提供了自由的学术气氛和比较充裕的财力保证。近年来,江西的学术事业和出版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连续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给江西文化艺术界和学术界以振奋,也引起了各兄弟省市的关注。这些成就的取得,为我们组织大规模著作的编撰工作提供了经验。而周边各省如湖北、湖南、浙江以及其他省市新编通史的纷纷问世,对《江西通史》的编撰是有力的推动,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从我个人来说,当时也恰恰能分出一些精力和时间来抓这件事情。于是尽力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为作者们、编者们排除各种障碍,以保证这项伟大工程的圆满完成。

四年来,《江西通史》的编撰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黄智权、吴新雄省长亲自过问此事并指示有关部门给予支持,省政协将其作为一件大的文化事业进行推动,省社联将其列为重大科研项目,江西师大、南昌大学、省社科院、省文物局、省博物馆和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也对参与编撰的专家们给予各种便利,出版部门派出了强大的编辑班子并准备了足够的启动和出版资金。特别要指出的是,各位作者在繁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能够将《江西通史》的

写作列入重要的工作计划并全身心地投入。我在第一次全体编撰会议上指出,《江西通史》的编撰是一项挖掘和弘扬江西历史文化传统的千秋事业,希望作者和编者将其视为自己学术生涯中的重大事业。事实证明,作者和编者后来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正是因为有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全体编撰人员的共同努力,11卷的《江西通史》才能顺利地完成书稿并得到如期出版。

明代中期,随着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修撰地方志成为一大文化现象。各省、各府乃至各县的省志、府志、县志大量涌现。此后遂为传统。盛世修志也不仅仅限于修前朝历史,更大量、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乃是修当地地方史。具有全局意义的江西省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自明中期以来,江西整体史著作已编撰过多部,其中著名的有:林庭楫《江西通志》(37卷,明嘉靖四年),王宗沐《江西省大志》(8卷,嘉靖三十五年;万历二十五年陆万垓增修),于成龙、杜果《江西通志》(54卷,清康熙二十二年),白潢、查慎行《西江志》(206卷,康熙五十九年),高其倬、谢旻《江西通志》(163卷,雍正十年),刘坤一、刘绎、赵之谦《江西通志》(180卷,光绪七年),吴宗慈、辛际周、周性初《江西通志稿》(9编,民国三十八年)。20世纪末,又有许怀林的《江西史稿》(1994年,江西高校出版社),陈文华、陈荣华主编的《江西通史》(199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问世。这些著作在保留江西历史遗存、挖掘江西历史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何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是对新编《江西通史》的重大考验。

为了使新的《江西通史》更具有时代特色和历史价值,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对这部著作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一、中国历史是一个整体,我们在研究任何地方历史的时候,都不能脱离这个整体。因此,正确认识各个历史时期江西在全国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必须充分关注江西与中央、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不溢美、不自卑,不关起门来论江西,将《江西通史》写成一部与中华民族的整体有着血肉联系的江西历史。

二、《江西通史》是系统记述和研究江西历史的大型学术著作,由众多学者共同参与完成。一方面,各卷是作者的个人成果,是作者最新研究成果的结晶,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所以希望作者精益求精,使其成为各自领域的学术精品。另一方面,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又必须是一个整体,是一部“通史”,所以全书11卷必须有统一的体例和统一的要求,在文风上一定要力求简

洁、明快。各卷作者务必服从整体、服从大局,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整个《江西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江西通史》必须是一部真实、动态、有可读性的信史。所谓真实,是指史料翔实、言必有据。此“据”是经过考证后认为合理的,否则,“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语)。这就需要每个作者既尽可能地系统爬梳和挖掘史料,又谨慎辨析和使用史料。所谓动态,是指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既将问题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又特别关注它的演进过程,因为即使是同一件事物,其状态和作用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这就需要每个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阐释历史、去探讨历史演进的规律。所谓有可读性,是指应该用流畅的文字、叙述的方法写作,展示的是作者的观点和结论,而不是考辨的过程,它的体例是史书而不是论文。无图不成书。图文并茂是中国出版物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特点,《江西通史》应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收集能够说明江西历史各阶段各方面状况的历史图片,以加强其历史感和可信度,同时也使其更具有可读性。

四、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基层社会为本。所谓以人为本,指的是要写成人的历史,以人的活动为描述对象,即使是制度、习俗,也应尽可能地有人的活动。所谓以民为本,指的是尽可能地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来叙述历史、看待历史,更多地叙述大众的活动。所谓以基层为本,是因为地方史本身就是基层乃至底层的历史,要尽可能地揭示基层组织和底层社会的活动状况。在此基础上,充分重视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对社会的主导作用,重视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特别是包括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政治制度等在内的上层建筑对个人、对大众、对底层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写成一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互动、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互动、社会精英与人民大众互动的历史。

11卷本《江西通史》即将付梓,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够成为江西历史研究的新的里程碑、能够成为江西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当然,能否达到这个目标,还要由读者和历史来检验。

导 论

隋唐五代(581—960年)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也是江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受政治、军事、地理、民情等因素的影响与作用,江西融入大中国历史的时间稍稍滞后,其“隋唐五代”应是始于公元589年杨隋占江西,而终于公元975年赵宋灭南唐。本卷即叙述这387年的江西历史。

开皇元年(581年),杨坚(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九年(589年),隋大军南下平陈,统一全国,结束了自汉末以来中国长期的分裂局面^①。

隋文帝为稳固大统一局面与杨氏天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政策措施。以政治为例,隋文帝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各对皇帝负责,由是皇权大大加强。在地方建置上,隋文帝确立州(郡)、县二级行政体制,并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由中央任免、考核。地方行政机构的简化和地方官任免权力集中于中央,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县以下设立乡、里、坊、村等基层组织,从而重新建立起类似秦汉的统一的封建集权体制。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进一步强化统治权力,同时因其浓厚的江南情结,

^① 自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后出现军阀割据至589年隋朝统一中国的400年间,除西晋有30余年的统一外,其余全国均处于分裂状态。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措施中处处显现出对南方的重视与眷顾。政治上,隋炀帝于洛阳建立东都、于扬州建立江都,一改隋前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本位”之政,行政权力逐渐向东方、南方倾斜。隋炀帝改革魏晋以来沿袭数百年的按门第高低选用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创立科举制,用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这既限制了门阀士族对选举的把持,又为庶族地主参政开辟了途径,同时提升了江南人士在隋政权中的地位,极有利于统治基础的稳固。经济上,隋朝在北方整理人口,改革均田制,实行新的租调制,使其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隋统一南方特别是隋炀帝主政后,为稳定南方,大力照顾南方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其经济制度基本予以维持,并实行赋税优惠政策,从而使六朝以来南方经济发展的良好形势得以继续与加强。特别是开凿大运河,沟通中国南北,不仅加强了对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控制,而且有利于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文化上,隋代敬佛崇道,弘扬儒家学说,使传统文化复兴。隋炀帝一反其父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大力鼓吹南方文化,遂使南方文化逐渐呈现出成为文化主流的历史趋势。

大一统的形势,统治者的励精图治与人民的辛勤劳动,使隋皇朝达到中国有史以来的强盛局面,但它实行“藏富于国”而不顾民生的政治经济政策,却导致了统治基础的严重危机。特别是隋炀帝厉行暴政,荼毒民命,不仅极大地加深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激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610年后,社会骚动不安,上层反叛,农民起义,势如燎原,隋朝分崩离析。618年隋太原留守李渊代隋建唐。

唐朝建立后,统治者吸收隋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革故鼎新,使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得到恢复与发展。以经济为例,唐朝前期,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通过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积极扶持小农经济,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由“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农业、手工业、道路交通、商业等全面进步,唐朝步入了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然而,强盛的唐朝深藏着严重的统治危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朝土地兼并加剧,人口流亡严重,均田制与租庸调制难以维持,作为国家基础的小农经济问题不断。特别是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者耽于淫乐,荒于政事,胡乱治国,加剧了唐帝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皇朝从繁荣昌盛的顶峰急剧坠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政治上,中央集权体制遭到极大的破坏,但基本能予以维持,特别是广大南方的地方行政制度并没有受到多大削弱;原先主要在边疆地区施行的节度使制度逐渐推广至内地;差遣使职制度盛行;以“进

士科”为中心的科举制度日益深入,庶族地主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经济上,统治者鉴于均田制与租庸调制难以维持的现实,实行两税法,全面改革赋役制度,更有利于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安史之乱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却重新配置经济资源,一些欠发达地区得到了新的机遇,广阔的南方地区的经济开发逐渐深入,长江中游地区成为当时中国发展最快的区域。有唐一代,统治者重视文化建设,官、私文化教育均较发达,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活跃,以诗歌为中心的文学创作和书法、绘画、雕塑、石窟艺术、音乐、舞蹈等众多艺术门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派繁荣景象。唐朝文化宽容,儒、释、道“三教”并重,儒学复兴,佛、道为代表的宗教文化达到鼎盛。总之,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社会经济文化仍曲折地向前发展,并在不少方面仍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安史之乱后百余年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交织,外患不断、民乱兵变不息,唐政权日渐衰微。最后经黄巢起义的沉重打击,终于土崩瓦解。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原黄巢义军将领、降唐后任命为宣武节度使的朱温,武力统一了黄河流域,遂废哀帝自立,改国号为梁,定都开封。从此中国境内梁、唐、晋、汉、周五代迭相更替,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楚、闽、荆南、南汉、北汉等十国相继建立。五代十国56人称帝称王,兵燹连绵,还有契丹等少数民族扰乱中原,整个中国长期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代周建宋,重新确立中原秩序。此时尚有南唐、后蜀、吴越、荆南、南汉、北汉等政权,割据从南到北的大片领土。直到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这种混乱的局面才结束。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与黑暗的时代,但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域内经济文化仍然得到发展。吴国奠基者杨行密占领江淮地区,为医治战争创伤,实行保境息民,招抚流亡,减租轻税等政策,使江淮地区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其后徐知诰执政,改革两税征收办法,不仅增多了国家税收,还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了江淮地区农桑生产的发展。南唐建国以后,继续减轻赋役,奖励开垦荒田,种植粮桑,发展手工业、商业,使南唐成为南方诸国最富强的国家。当然,在军国时代,南唐统治者的榨取政策也对本区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少消极的影响。另外,南唐统治者的文化素质较高,也极为重视文化的建设,以致在混乱的时期仍取得不凡的文化成就,使南唐成为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文化兴盛地域。

总体而言,隋唐五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繁荣和成熟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成就足以辉煌一世,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正是这一历史形势,江西地区创造出大大超越前代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大中国历史发展同步。与此同时,也因本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二

自西汉初年在江西地区建立郡县机构后,本区的行政体制一步步得到发展,并随着区域的清晰而逐渐趋于合理。隋唐五代时期是江西行政体制走向完备的关键时期。

隋朝统一中国后,地方行政体制沿袭前代而又多有创制,在全国推行郡县二级行政体制,并针对州(郡)县多而户口少的弊病,裁闲并小。隋政权依据江西地区政治、经济、地理等实际,将南朝陈时的7郡60余县,整理为7郡24县,比较合理地解决了本区的行政区域。虽然隋在江西的统治较短,这种体制在当朝发挥的作用有限,却为其后的唐皇朝在江西建立统治机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确立“道”制,从事实上重建了地方的三级行政机制,使地方的统治体系更加合理,中央集权体制进一步加强。唐太宗时开设了“江南道”,唐玄宗时将其析分为“江南西道”、“江南东道”和“黔中道”。其中“江南西道”辖今赣、湘两省及皖南、鄂东地区,治所确立在洪州(南昌),“江西”由此得名。唐中期以来,江西设江南西道,设观察使(有时为节度使),管辖洪、饶、吉、江、虔、袁、抚、信等8州,江西省域框架基本形成。有唐一代,江西州县的增置主要是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结果。

江西“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地理形势,素为中原皇朝用兵南方重要区域。早在秦汉用兵岭南、百越时就显示了重要的军事地理的作用。由于江西影响南方的兵要地理,唐政府对江西控制相对严格。不过,其政治地位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提高。这从任职江西的行政长官很少是统治集团的核心(重要)人物可略知一二。江西是唐代政权稳定的重要力量,安史之乱及其藩镇割据对江西地区政治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江西坚定地支持中央政权,输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对中央平定安史之乱及牵制藩镇割据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唐后期,南方边地往往一有时机就游离中央政权,甚至武力相向。江西因